

新古典现实主义 国际政治理论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RRIN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STEVEN E. LOBELL

[加拿大] 诺林·里普斯曼

[美] 杰弗里·托利弗 [美] 斯蒂芬·洛贝尔 著

刘丰 张晨 译 刘丰 校

东方
编译
所译
丛

新古典现实主义 国际政治理论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ORRIN M. RIPSAN

JEFFREY W. TALIAFERRO STEVEN E. LOBELL

[加拿大] 诺林·里普斯曼

[美] 杰弗里·托利弗 [美] 斯蒂芬·洛贝尔 著

刘丰张晨译 刘丰校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加)诺林·里普斯曼, (美)杰弗里·托利弗, (美)斯蒂芬·洛贝尔著; 刘丰, 张晨译; 刘丰校.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BN 978-7-208-14599-3

I. ①新… II. ①诺… ②杰… ③斯… ④刘… ⑤张… III. ①国际政治-理论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4678 号

责任编辑 王 冲

封面装帧 小阳工作室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加]诺林·里普斯曼

[美]杰弗里·托利弗 著

[美]斯蒂芬·洛贝尔

刘 丰 张 晨 译 刘 丰 校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3 插页 4 字数 183,000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599-3/D·3058

定价 42.00 元

献给我们的家人

译者前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与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理论等学派展开外部论战的同时,现实主义这一理论传统内部也发生分化,综合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要素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独树一帜,成为现实主义理论内部最为活跃的分支,吸引了一大批学者围绕其开展理论建构和经验拓展。

本书三位作者,诺林·里普斯曼、斯蒂芬·洛贝尔和杰弗里·托利弗,就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代表性学者,他们分别撰写了利用这一理论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的专著,并且联合主编了几部著作。正是在前期所做的探索和积累的基础上,三位作者意识到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面临的诸多误解、质疑和批判,试图在这本书中澄清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基本要素和内在逻辑,提供更为系统而严密的理论论述,从而推动其发展。

在过往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中,学者们大致形成了以下共识。首先,这一理论是现实主义内部的一个分支,与解释国际政治结果的结构现实主义不同,它的关注点是不同国家在同一时期或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战略选择存在的差异,聚焦于在外交政策领域构建理论。其次,该理论将国际体系的特征作为自变量,将国内政治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强调后者在塑造具体国家的战略选择时传导、强化或扭曲前者发出的指令,但国内变量并不具有独立的因果效应。再次,这一理论所催生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个案研究和比较案例研究等定性方法,用扎实的历史事件分析和细

致的过程追踪来论证其核心因果逻辑。

尽管广为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尤其体现在理论构建的严谨性上。一方面,新古典现实主义缺乏一个统一的核心概念。大量的国内政治变量被引入进来,甚至每位自我标榜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所使用的具体国内变量都有所不同,比如领导人认知、国家动员能力、国家自主性、风险偏好、战略文化,等等。另一方面,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因果关系不够明晰。尽管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大多主张将体系层次变量作为自变量,但在多数研究中,体系变量更像是一个不变的背景要素,其具体构成要素以及与单元层次的交互作用方式并不明确。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雄心勃勃的理论著作,三位作者提出了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既超越了只解释结构现实主义反常案例的第一代研究,也超越了专注于外交政策理论构建的第二代研究。在此,三位作者确实重塑了新古典现实主义,在继承过往研究的基础上尝试着改进其内在缺陷,使之范围更广泛,概念更清晰,逻辑更明确。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适用范围得到重新定义。三位作者不仅寻求构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也试图将其上升为一种与结构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国际政治理论。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该理论既可以解释具体国家的战略选择,也可以解释国际体系变迁等国际结果。他们的理由是,由于国际体系的性质本身是由国家特别是大国塑造的,大国战略选择及其互动与国际体系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比如,几个大国间爆发战争会推动国际结构从多极变成两极。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关键概念得到重新厘清。这一理论的特点是跨越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构建起跨层次的分析框架。但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上要素众多,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哪些要素能够被纳入到理论之中。在国际体系层次,作者拓宽了结构现实主义对体系的理解,除国家间实力对比这一结构性要素之外,纳入了国际体系所呈现的威胁和机遇的清晰度以及战略环境的性质这两个要素。在国内层次,作者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聚焦在了领导人意象、战略文化、国内制度和国家-社会关系四组变量之上。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内在逻辑得到重新阐述。三位作者提供了比以往

研究更多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要素。为了搭建起一个更严谨、自洽的分析框架,他们将这些变量组织在一个有机联系的因果链条之中。在此,重点是阐明自变量如何通过中介变量发挥作用,尤其是哪些中介变量会发挥影响,以及具体影响的程度。作者强调,四组国内政治变量并不会同时同等地发挥影响。相反,它们通过认知(政策评估)、决策(政策制定)和实施(政策执行)三个阶段渗入国内决策过程,并且在每个阶段发挥影响的因素并不相同。此外,这些因素的作用方式和程度受制于体系性质和时间范围两个维度。这套分析逻辑在书中第二章至第四章的相关图表中得到了详细展示。

通过上述努力,三位作者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为了展示这一理论的效力,本书尝试解决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四个经久不衰的争论,包括采取制衡战略还是追随战略更合理,霸权或单极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更可取,以及物质因素还是观念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更大。几位作者主张,这四个争论中彼此对立的立场并不全对,也不全错,而是有条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本书所强调的自变量——国际战略环境的性质。无论提供的答案正确与否,作者的思路无疑代表了一种新的理论创新路径,即在原本彼此对立的理论立场之间建立联系,通过揭示具体命题成立的条件来解决它们的分歧。

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并非易事,当前人们普遍认为理论研究陷入了困境。但理论研究者的可贵品质是踏实探索,而不是“喊口号”或“泼冷水”。正如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所表明的,一群对理论事业有志趣、有追求的同仁仍在扎实进取,寻求在解决既有理论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中推动其向前发展。本书所提供的分析框架并非新古典现实主义内在缺陷和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但不失为一种系统的、有益的尝试。显然,作者既解决了一些存在已久的问题,也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论问题和思路。这些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包括,国内政治变量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外交政策与国际结果之间的关系,时间尺度对于理解战略选择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性,整合范式内或范式间理论的可能性,等等。新古典现实主义自其产生开始就没有停留在一种抽象理论之上,甚至在本书出版之前,其理论化程度大大低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包括现实主义内部的其他分

支。翻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可以发现,理论构建工作所占篇幅常常不过是开展案例研究之前的一个章节。但是,这一理论在过去十多年间之所以蓬勃发展,是因为跨越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两个层次之间的鸿沟这一核心理念得到大量的分析者的认同,愿意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开展具体的经验研究,丰富我们对国际政治中的经验现实的理解。这本书则着力于更坚实的理论构建工作,为未来的实证研究留下了巨大空间。期待这本书引起国内有志于利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从事实证研究的同行的关注,用更加丰富的经验材料和事实证据加以运用、修正和扩展。

刘 丰

2017年5月30日

致 谢

本书是一项为期 12 年之久的合作项目的最终成果，这个项目始于 2003 年 2 月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举办的国际研究协会年会。我们三位都曾分别拷问国际关系文献中同样的理论问题。我们每一个都曾研究过国际安全的不同方面，但是对这一领域中的范式僵化深感沮丧。为了获得解释力，我们自己的著述既跨越了范式界限，又跨越了分析层次。不过，我们坚信国家行为面临的结构性制约的重要性，以及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的有用性。《安全研究》的创刊编辑本·弗兰克尔(Ben Frankel)是年轻学者的良师益友，将他们组织到一个网络之中。他引导和鼓励我们围绕共同兴趣展开探索，以丰富现实主义理论。

在《世界政治》杂志 1998 年春季号一篇评述四部著作的文章中，吉迪恩·罗斯(Gideon Rose)创造了“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个概念。在那篇文章中，罗斯认为四部著作[分别由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和威廉·C.沃尔福思(William C.Wohlforth 撰写)]构成了一个新的外交政策中层理论学派。正如他所构想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尝试综合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理念——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对国家施加的约束——和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爱德华·卡尔(E.H.Carr)以及其他 20 世纪古典现实主义者关于谋略(statecraft)和国家-社会关系复杂性的实用见解。

事实上,我们三人在各自的第一部著作中都没有使用“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个术语,但我们对它深表认同。我们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不只是罗斯对其所评论四部著作的一次性命名。我们也相信新古典现实主义可以成为一个紧密的研究纲领。只要我们能够界定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一致范围和内容,避免它成为一种单纯的描述性理论或是一种不够确定的折中路径,那么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可以解释的就不仅仅是结构现实主义偶尔出现的异例。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家与外交政策》(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这部共同主编的论文集是我们致力于确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界限和范围的第一步。这部文集产生于蒙特利尔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的一次会议,在会议中,我们将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国家视为理解外交政策决策制定的前提。我们共同主编的第二部论文集《大战略的挑战: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国与平衡破裂》(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进一步发展了我们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思考,尤其是不同大国面临的战略环境的重要性。本书所引入的理论我们称之为“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这是一组旨在解释从单个国家的短期危机决策现象到国际后果和结构变迁的更广泛模式的理论。

如果没有万维网、虚拟网络和语音软件的出现,那么我们的合作会更加困难。我们将各章初稿上传到犹他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的网盘上。Skype 软件极大地推动了这本书的完成。在过去两年里,我们每周(或至少每两周)在 Skype 上会面,经常持续两小时。我们也在芝加哥(2013 年 2 月)、波士顿(2014 年 1 月)和盐湖城(2015 年 1 月)举行了面对面的作者研讨会。

我们要感谢多家机构的研究支持:诺林·里普斯曼(Norrin Ripsman)获得了魁北克社会与文化研究基金以及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研究理事会的研究资助;杰弗里·托利弗(Jeff Taliaferro)获得了塔夫茨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办公室以及艺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研究奖励委员会的研究资助;斯蒂芬·洛贝尔尔(Steven Lobell)获得了犹他大学研究委员会的教师研究奖励。

多年来,我们(个人以及共同)得到了萨米·巴尔金(Sammy Barkin)、

贝丝·布拉德古德(Beth Bloodgood)、马克·布劳利(Mark Brawley)、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蒂莫西·克劳福德(Timothy Crawford)、米歇尔·德施(Michael Desch)、戴维·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马克·哈斯(Mark Haas)、保罗·科沃特(Paul Kowert)、罗布·克雷布斯(Rob Krebs)、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戴维·莱克(David Lake)、帕特里克·詹姆斯(Patrick James)、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杰克·利维(Jack Levy)、丹·林德利(Dan Lindley)、迈克尔·利普森(Michael Lipson)、塞巴斯蒂安·曼维尔(Sébastien Manville)、本杰明·米勒(Benjamin Miller)、汉斯·莫里生(Hans Mouritzen)、图德·奥内亚(Tudor Onea)、约翰·欧文(John Owen)、T.V.保罗(T.V.Paul)、约瑟夫·帕伦特(Joseph Parent)、加利亚·普雷斯·巴纳森(Galia Press-Barnathan)、杰里米·普雷斯曼(Jeremy Pressman)、亚历克斯·赖克温(Alex Reichwein)、埃文·雷斯尼克(Evan Resnick)、塞巴斯蒂安·罗萨托(Sebastian Rosato)、拉里·鲁宾(Larry Rubin)、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斯科特·西尔弗斯通(Scott Silverstone)、珍妮弗·斯特林·福克(Jennifer Sterling-Folker)、阿赛尔·托耶(Asle Toje)、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和安德斯·韦弗(Anders Wivel)的意见。我们对他们每个人表示感激。

我们分别在康奈尔大学、康涅狄格大学、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海法大学、麦吉尔大学、诺特丹大学及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检验了我们的观点，并展示在书中的部分章节。

在整理书稿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布里塔尼·格里芬(Brittany Griffin)、索格海·米凯利安(Shoghig Mikaelian)和亚历山大·伍尔泽瓦(Aleksandra Vuldzheva)出色的研究协助。布里塔尼帮助我们编辑了书稿格式。

我们要特别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尤其要感谢我们的责任编辑戴夫·麦克布莱德(Dave McBride)。他最早鼓励我们写作这本书，并且自始至终鼓励我们。我们也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凯蒂·韦弗(Katie Weaver)，帮助我们驾驭出版流程。

我们三人也要由衷地感谢我们的家人，他们在这项漫长的努力过程中给了我们爱和支持。没有他们，这本书不可能完成。

诺林·里普斯曼 杰弗里·托利弗 斯蒂芬·洛贝尔
加拿大多伦多 美国麻省波士顿 美国犹他州盐湖城

2015年9月

目 录

译者前言 / I

致 谢 / V

导 论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 1

第一章 新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的局限 / 16

第二章 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范式及其自变量 / 33

第三章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中介变量 / 58

第四章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范围和领域：因变量 / 81

第五章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方法论 / 100

第六章 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解决关键理论争论 / 138

第七章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未來研究议程 / 160

导 论

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

超越外交政策研究路径,走向国际政治理论

在本书中,我们构造出一种研究国际政治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纲领。我们提出,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可以解释的政治现象涵盖了从单个国家的短期危机决策、外交行为和大战略调整模式到体系后果,最终再到国际体系结构本身演变的范围。由此,我们所讨论的范围远远超出既有新古典现实主义文献所论述的外交政策行为理论,这些理论试图回答结构现实主义的异常案例或解释外交政策行为。¹在此,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研究纲领,提供比传统的替代性理论(包括结构性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更强的解释力。

正如我们在第四章将详细论述的,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在外交政策理论与国际政治理论之间作出截然区分的作法有些夸张,而且产生了反效果。²显然,国际体系影响外交政策,一如各国必须使它们的政策适应体系带来的各种威胁和机遇。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各国(尤其是大国)的战略选择对国际后果和国际体系本身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如果某个大国未能充分制衡日益强大的威胁,或者采取激怒其他大国的扩张政策,这些选择会导致战争的爆发、扩散及最终结果。战争结果——比如某个大国战败或衰弱——进而会影响国际体系的结构,使其

从多极变成两极,或从两极变成单极。因此,为了发展新古典现实主义,我们认为,将国际领域与危机决策、外交政策和大战略等领域截然分离的作法是有问题的。国内层次变量对于解释后者而言是相关的,因此至少也与前者具有某种因果关联。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澄清这些变量在哪些条件下对于解释危机决策、外交政策、大战略、国际后果以及国际体系的结构变迁而言是相关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重要的,它们在什么时候会产生更大影响,以及它们如何与体系原因交互作用。

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附加值

我们主张,来自其他主要国际关系研究纲领的理论——结构性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建构主义——其实只能阐明外交政策或国际政治中相对较少的内容。考察一下结构现实主义,仅在极少数情形下,国际体系提供了国家所面对的外部约束和机遇的明确信息。因此,比如面对1967年6月埃及国内动员、封锁蒂朗海峡以及联合国撤出西奈半岛的维和部队,以色列十分清楚它所面临的威胁以及应对威胁的政策选项非常有限。³类似地,1962年秋苏联将进攻性核导弹运入古巴给美国的生存带来清晰而又迫切的危险,极大地限制了它的政策选项的范围。在这些情形下,即便存在着围绕最优政策应对方案展开辩论的空间——正如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讨论所见证的,国际上的紧迫需要,而不是国内政治考量,大大限制了潜在选项的范围。⁴国际体系极少提供那种程度的清晰度和确定性。在多数情形下,围绕国际威胁和机遇展开辩论的空间很大。因此,20世纪30年代英国内阁可以就德国还是日本对英国利益构成更大威胁展开辩论,而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头十年美国决策者和学者也可以围绕崛起的中国应该是予以遏制的威胁还是加以接触的对手进行辩论。⁵

类似地,由于贬低了国际压力的重要性,各种国内政治路径也无法让我们更多地理解国家的外交政策决策和大战略,尤其是在面临高风险外部挑战的时期。仅在一些极端案例中,比如领导人面临败选、革命或政变

等情况时,国家的政策决策才单单(或主要)考虑国内政治原因。因此,20世纪70年代,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当时他刚上台不久,并且不如前任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受欢迎——在面临国内要求收复西奈半岛的巨大压力时,他判断自己如果不对更加强大的以色列发动战争就无法继续掌权。⁶类似地,1982年,阿根廷总统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Leopoldo Galtieri)在没有指望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会卷入的情况下,冒险与更加强大而且是美国最亲密盟友的英国开战,因为他认为自己在阿根廷国内的军人统治受到严峻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而且断定如果控制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就会挽救自己的政府。⁷不过,正如图0.1所示,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通常在这些极端情形之间展开,国内或国际压力都无法单独决定事件走向,施动者(agent)和结构(structure)综合起来产生结果。即使在上文所讨论的极特殊情况下,国内或体系层次理论都不具有完全的决定性(这就是图中曲线为何不会与渐近线相交的原因)。由此,比如即使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也意识到,距离中期选举只有一个月,如果回应不够强硬,会激起国会和美国民众的愤怒。⁸同样,在1973年战争期间,萨达特只对西奈半岛发动了一场有限进攻,担心全面打击西奈半岛或内格夫会遭到拥有核武器的以色列危险地冲突升级。因此,尽管在极端情形下,体系或国内环境会成为主导性因素,但它们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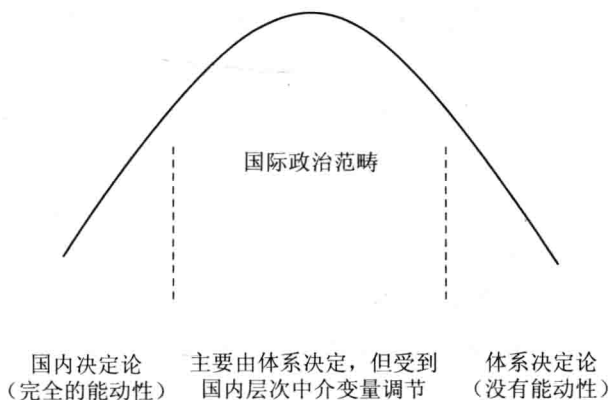


图 0.1 体系和国内变量的相对因果权重

决定性因素。由此,国内政治(Innerpolitik)理论是不充分的,它们只对解释接近左侧渐近线的有限范围情形最有用。同样,体系理论也是不充分的,只对右侧渐近线的较小范围情形具有最大解释力。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国内政治路径中有影响的一个子集。正如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包括各种民主(自由)和平论、商业自由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建立在‘自下而上’的政治观之上,认为个人和社会团体的需求在分析上先于政治”。⁹对自由主义者而言,国家不是自主或独立的行为体,而是会选择反映主导性社会联盟的总体偏好的政策。因此,这些社会行为体,而非国际压力,是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的驱动力。

即便是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及其学生主张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以及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和丹尼尔·德德尼(Daniel Deudney)提出的体系性自由主义理论,本质上也是国内政治路径,因为他们认为国家以及——作为延伸——它们所建立的国际制度最终取决于被统治者的同意。¹⁰国际制度可以增进复杂动机环境下的理性利己者之间的互惠和持续合作,即便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各国之所以建立和参与国际制度,是因为这么做让它们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透明度、议题联系、监督履约、调解纠纷等方式取得增效收益。这进而让参与其中的各国为各自的社会带来绝对收益。因此,自由制度主义的因果机制是给作为整体的社会带来增效收益,无论这收益是经济财富还是军事安全。这意味着,制度主义与其他自由主义分支类似,遵循国内政治的因果逻辑。

我们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并不是说自由民主、国际制度、国家间贸易流动都是附带现象。相反,我们认为,自由主义理论贬低了相对实力分布的重要性,仅聚焦制度、自由民主和贸易,排除了权力政治,这对于解释国际政治的许多方面而言是有限制的。¹¹而且,通过社会偏好的聚合来解释国家行为,自由主义忽视了外交政策执行者——那些担负着制定外交和安全政策、位于国内政治和国际舞台的交叉点上的部长和官员们——的核心作用。

研究国际政治的第三种主要路径——建构主义——也没有为我们带